

大河之北

(上接第九版)

2012年8月16日,沧州博物馆,“大运河河北”展厅。“邯郸、邢台、衡水、沧州、廊坊……”站在展厅入口的中国大运河线路图前,一位游客自南向北,数着大运河流经的河北5座城市。

在5座城市里,沧州是唯一一座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的城市。

这并非偶然。事实上,如今沧州市区位置的选择,和大运河的兴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、水旱两路的咽喉。之后,两岸商贾云集,沧州城依运河而兴旺昌盛。

“元末明初,位于运河东岸的沧州旧城开始衰败,临近运河的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,逐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。”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郑志利说。

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记载:“沧州洪武二年(公元1369年)五月徙于长芦。”

长芦,位于大运河西岸,今天的沧州城,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繁忙的运河航线上,主要流通着哪些商品?

京杭大运河,在明代又称漕河。漕粮,明清两代,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,每年都有约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。京杭大运河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。

不过,漕粮运输是官方行为,南北民间物资的贸易往来,才是激发大运河活力的最大力量。

2021年9月21日,沧州。

正值金丝小枣收获的季节,沧县高川乡北马坦村果农张文荣早早来到自己的枣园,开始和雇工们一起打枣。

她拿着手中的细竹竿,游走在树枝和树叶之间,似乎没费多大力气,一颗颗小枣就纷纷散落在地上。张文荣弯下腰,把它们一一拾进筐里。

通过现代物流的高效运输,不久之后,这些有着独特风味的金丝小枣,将出现在中国20多个省(市、区)的大型超市和东南亚、韩国、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事实上,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,沧州枣就依靠运河南下北上,打开了南北市场。

“沧州枣最早的市场,在沧州城西大运河西畔,在明末清初已经有一定规模,通过运河,北上京城,南下江浙闽粤,是远近闻名的运河特产。”郑志利说。

曾经通过大运河南下北上的,不止水果。北方的小麦、棉花、砖石、生铁、粪肥、皮毛、煤炭,南方的稻米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盐、竹器、木料……大运河这条“黄金水道”,在交通不便的古代,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南北互通有无。

“五兄弟每人推一辆独轮车,因为路途遥远,他们总要带上多双布鞋,穿烂一双再换一双接着走,没有五六双鞋,到不了目的地。”安秋生说。

尽管路途艰难,但关内外药材差价让五兄弟获利颇丰。几年之后,他们在沈阳设店经营,改行商为坐商,药号“临泰”。

“临泰”药号在沈阳的设立,是武安商人在关外扎根经商的起点。

“五架小车闯关东”的成功,极大鼓舞了武安药商。自此,武安商人投资重点转向关东。

武安在东北的经营达到顶峰,是在清末民初。

“当时,关内百姓大规模移民东北,移民区缺医少药,武安药商抓住机遇,移民聚集到哪里,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,逐步形成‘凡是冒烟的地方,都有武安人在卖药’的规模。”

武氏家族的“临泰”药号在东北规模最大,“连锁店”众多,黑龙江哈尔滨的“德泰恒”、沈阳的“德泰兴”、哈尔滨阿城的“恒泰德”、吉林公主岭的“德泰祥”等,都是武家产业。

2021年9月10日,邯郸武安,武安广场。广场北端,矗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,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,雕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。

在第七根文化柱上,雕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:“南绸北药”。

“北药”,指武安药商在东北的药材生意,而“南绸”,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绸布生意。

绸布,是“武安商帮”主要经营的另一个行业。

“武安商人的绸布生意,从安阳、郑州、开封,一直开到苏州、上海。另外,在太原、西安等地,也有不少绸缎庄,太原历史上最早的‘宏顺德’绸缎庄,就是武安人开的。直到今天,苏州仍保存有武安绸布商人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。”安秋生说。

据史料记载,1934年,武安的人口为377515人。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,从业25000余人,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,从业20000余人。武安商人的经商范围,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,至少在18个省(市、区)以上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由于关内关外的交通阻隔,加之中医中药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退居次要地位,武安商帮的传奇悄然落幕。

高阳布商:转型样本

2021年7月21日,高阳某纺织公司缝纫车间。

随着机器的不断运行,一条条数米长的半成品毛巾,正在流水线上快速裁剪。

短短1分钟内,一条未经裁剪的大毛巾,被均匀裁剪成十几条尺寸一致的成品毛巾。几乎同时,折边、加标、缝纫等工序也同步完成。整个过程由机器自动化完成,没有一名工人参与。

这条流水线,是全自动毛巾横缝机。过去,使用人工缝纫设备每人每天缝1000条毛巾,而全自动毛巾横缝机每台每天可缝12000条毛巾。

高阳,中国纺织之乡,可以年产毛巾50亿条、毛毯4.5万吨,今天全国市场上每三条毛巾,有一条产自高阳。

今天高阳市场的繁荣,离不开一代代高阳布商的努力,他们就是“高阳帮”的代表。

高阳出布商,这与当地棉花的引种历史密切相关。

“明初,棉花种植引入河北,到明代中后期,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开始种植棉花,纺线织布。”文史专家、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说。

棉花的引入,是河北古代农作物种植史上一件大事。

棉花喜温、喜光、怕涝,在≥10℃积温3500℃以上、≥15℃的持续日数在150天以上、最热月气温>25℃、年日照时数>1500小时、年降水600毫米左右的平原地区最适于生长。

根据这个条件,保定定兴以南的京广铁路沿线和石德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,都非常适宜种植棉花。在新疆引种棉花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,河北都是“中国产棉第一省”。

高阳,正处在这片棉花适宜种植区的北部。

(下转第十一版)

商帮:近代河北商业的代表

“吹儿商”:更懂东北

2021年8月4日,吉林长春。

在亚泰大街以东、东西马路和惠工路之间,有一条长约五六百米的商业街。

在这条并不算宽阔的小街上,商铺鳞次栉比,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。街边的路牌上,赫然写着三个字:“乐亭街”。

记者随机进行询问,大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乐亭街因何而得名,而几位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,则能清楚讲出乐亭街的来历:100多年前,有许多来自河北乐亭的商人居住于此,这条街便因此得名。

此外,因当年这些来自乐亭及周边地区的人说话带有口音,当地人便送给这些乐亭商人一个昵称——“老吹儿”,这条街此前也被叫作“老吹儿街”。

河北和吉林并不接壤,乐亭和长春相距数百公里,两地如何产生联系?乐亭商人为何能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?

这一切,还要从近代冀商最重要的商帮之一——“吹儿商”的崛起说起。

“吹儿商”第一代东北“商业淘金者”的代表,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、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长途贩运小贩——刘新亭。

《乐亭县志》记载,乐亭刘家祖籍河南府,明万历年间迁入乐亭刘石各庄。早年间,刘家是地道的庄稼人,靠几亩薄田支撑家业。

“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,他听说当时东北的龙湾(今吉林农安)一带正在招垦开荒,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,于是就用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锄头、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,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、麻和粮豆等产品,到京畿等地去卖。”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说。

随后的10年间,刘新亭借此获利数百万吊,为刘家的兴盛奠定基础。

经过数十年奋斗,到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刘新亭的3个孙子分家时,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,包括大车店、榨油坊,并办起了钱庄。

到清末民初,刘家的生意北到黑龙江,南到上海,覆盖了大半个中国。

随着1898年关内外铁路(后改称京奉铁路)的开通,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,乐亭商人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,并快速扩张。

1906年,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务总会,董事19人中,有9名是河北乐亭人,可见当时“吹儿商”在当地的重要地位。

1907年,长春商务总会成立,第一任会长王获人便是乐亭人。国民党统治时期,长春有人倡议成立“乐亭同乡会”,当时在长春的乐亭人约有5万,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7%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同样在东北经商的晋商,地位逐渐被“吹儿商”取代。

为什么以刘新亭为代表的“吹儿商”,能在东北发展壮大?

“首先是地缘优势,‘吹儿商’的大本营乐亭与山西相比,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靠近,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性更强。刘家到了第三代,将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入东北,已经能对东北各重镇的商业行情做出预测。”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明信说。

可以说,“吹儿商”更懂东北。

在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(1927年—1937年),又一位“吹儿商”在东北写下传奇。

1927年8月8日,哈尔滨。

这一天,一家名为“同记”的大商场在哈尔滨开业,场面火爆。商场面积1000余平方米,门口一扇高4.7米、宽7.4米,从比利时定制的橱窗,号称全国最大,一时成为市民的“打卡地”。

定制这扇橱窗的,是同记商场的老板——武百祥。今天的哈尔滨人,大多已经不熟悉这个名字。但提起同记商场,在哈尔滨几乎无人不晓。在哈尔滨流传着一句话:“没逛过‘同记’就不算到过哈尔滨。”

同记商场当时的营业许可执照,现在收藏于东北抗联博物馆,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武百祥,乐亭“吹儿商”民国时期的代表商人。

20世纪20年代,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同记商场和大罗新环球货店的开业,是东北三省民族商业发展的标志性大事。

新一代“吹儿商”继承了老一辈商人的吃苦耐劳和商业眼光,更在当时学习西方的大环境下,表现出极大

的改革勇气。

1919年,“同记”从美国购进现代纺织设备,研究上海的名牌袜子,创造自己的袜子品牌“白熊牌”。

白熊牌袜子采取新奇的营销方式,宣传人员抬着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,敲锣打鼓,沿街游行,一路散发广告单。

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推广方式,在一百多年前令人耳目一新,同行争相效仿。

这一时期,“京东第一家”刘家已经到第五代经营者,他们也改变经营模式,从以钱粮业为主改为商业、金融、工业并举。

刘家的“益发合”,是新中国成立前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,鼎盛时期流动资金就达400万银大洋,有大约500名工人。

“益发合”旗下的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设立的益通银行,是当时东北第一家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银行。

1936年,武百祥的“同记”与刘家的“益发合”学习借鉴国外工商业先进经验,带头推行股份制改革,成为分部众多、地域广阔、工商并举的股份制大企业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随着日军对东北经济控制的加强,乐亭商人在东北经营的商业开始衰败没落。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,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,“吹儿商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武安商帮:南绸北药

2019年10月9日,邯郸武安,伯延古镇。

“各位东家、掌柜的一路辛苦,里面请……”随着“大管家”一声开场白,武安市伯延古镇实景剧《商帮归来》拉开帷幕,再现150多年前武安药商两大家族的经商故事和家国情怀。

伯延古镇,地处武安市城南,至今镇上有徐家庄园、房家庄园、王顺庄园等150多座清末、民国老建筑,是武安商帮商界传奇的见证。

作为冀商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武安商帮”在清末民初曾创造巨大辉煌。

“武安商帮最大的特点是‘一县之地独为帮’,成员所属地域范围小,几乎全部都来自武安,这与大多数商帮都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片区形式出现非常不同。”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说。

为何地处北方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的武安人,会上经商之路?

“武安人经商之路,最初是被太行山区穷困匮乏的自然耕作条件逼出来的。”研究“武安商帮”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。

武安,地处河北、山西、河南三省交界,太行深山之中,山岳地貌几乎占武安总面积的一半,另一半是丘陵、土地贫瘠,难以耕种。

穷则思变。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,早在明嘉靖年间,为了养家糊口,武安人就纷纷走出大山从事商业贸易。

武安商帮从明末兴起,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,历史跨越300余年。

2021年8月15日,武安博物馆。

博物馆中,一件当年武安药商最常用的老物件,放在精致的木盒中,许多参观者却叫不出一叫出它的名字。

戥(děng)子,一种小型杆秤,是古代专门用来称量分量小的贵金属、贵重药材的精密称量工具。

这件展品,是武安博物馆筹建征集馆藏时,武安上团城乡下团城村一位村民捐赠的。

生活在大山里的武安人,常年与草药打交道,所以兴起于明朝中后期的武安商人,起初就是以贩卖药材为主。

今天,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杆戥子曾见证了武安商人怎样的创业路,但“五架小车上关东”,已成为讲述武安商人到东北开疆拓土的经典故事。

冀商中,闯关东的不止“吹儿商”,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。

最初因为地缘相近,贩卖草药起家的武安商人,主要在河北安国、河南沁阳两大著名药材集散地之间贩运药材。清乾隆年间,武安人深感在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难有大发展,于是决定到还是商业蓝海的东北去闯荡。

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,是龙泉村的武氏五兄弟。

他们走的是往返长达两千里的药材贩运之路:从保定安国购买药材,再到辽宁沈阳销售,再把东北“关药”人参、鹿茸、防风子、五味子等运回内地。

地处“冀南棉海”的那台南宮棉花丰收。
河北日报资料片



“吹儿商”代表人物之一武百祥。
河北日报资料片



上世纪20年代,“吹儿商”在哈尔滨开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。
河北日报资料片



20世纪30年代,东北一家武安药号伙计们的合影。
河北日报资料片



武安市伯延古镇内的四合院式古建筑。100多年前,武安商帮的传奇故事曾在这里发生。
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

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商贸篇(上)